

陈永全 萧 崑◇主编



国外专家 谈 中国经济问题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Experts on
Chinese Economy

独家专访
首次披露



经济日报出版社



A094128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陈永全, 萧巖 主编.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7

ISBN 7-80127-342-7

I. 国... II. ①陈... ②萧... III. 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2417 号

国外专家谈中国经济问题

主 编	陈永全 萧 巖
责任编辑	文 森
责任校对	张惠利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 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 张	7 印张
印 数	8001-11000 册
ISBN 7-80127-342-7 / F·209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1999年初，经萧崑先生的介绍，我与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托马斯·罗斯基先生在广州见面，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罗斯基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他从70年代初中美两国刚刚开始恢复接触时起，20多年来多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许多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在访问期间，罗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深邃观察和精辟的分析使我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与罗斯基教授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萌发了对外国一些著名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系列访问的想法，并试图通过这个项目把国外一些著名的专家

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使我们能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向罗斯基教授表达了这个意见后，很荣幸地得到了他的赞赏和大力协助。通过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罗斯基教授为我介绍了一批国际上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可以说，没有罗斯基教授的帮助，这个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访问工作是从1999年的下半年正式展开的。与专家学者的联系、采访的前期准备、访问及整理工作都是由萧崑先生独自完成。萧崑先生19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专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负笈美国，在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在繁忙的学习之余独自一人高质量地完成如此繁杂的工作，萧崑先生的能力和干劲使我肃然起敬。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访问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观点，是根据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从他们的学术背景出发得出的，肯定有不正确和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的商榷和讨论。读者在遇到这些情况时要充分地注意。例如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过于低调，有些人有鼓吹“私有制”的倾向。其实对于国外学者的观点，我们一直是主张批判地吸收，闭门

造车固然不对，不加思考不分良莠地全盘接受则更成问题。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中搞“休克疗法”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访问中，大卫·兰普顿先生为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相信哈佛的所谓专家学者们的“高招”，虽然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相信我们的读者现在对外界的情况已经有相当的了解，盲目相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少。但在此还想再次提醒读者，我们把这些外国专家学者的观点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主要是想让中国的读者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起一个思想碰撞和启发参考的作用。

最后，我还想向深圳市委党校的许剑波博士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所付出的汗水表示感谢。

陈永全

2000年5月



邹至庄 (Greg Chow), 1951 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 1952 年和 1955 年分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经前后担任过《美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经济模型》等多家经济学学术杂志的编辑和合作编辑, 出版作品包括 10 部专著和超过 160 篇文章。邹教授在 1981 年到 1994 年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对华交流委员会主席, 并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 担任美国在华经济教育与研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邹教授目前还是中国的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的名誉教授, 并担任岭南学院的名誉院长, 其著述《中国经济》已被翻译成中文, 并拥有广泛的读者。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 前景光明

问：首先我们想听听您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目前有一些中国经济研究专家认为，即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似乎已经到了尽头。您的意见呢？

3

答：一个时期以来，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斯·拉迪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抱否定的态度。我见过拉迪好多次，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作出长期预测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先看看短期趋势。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8%的增长率目标，实际实现了大约7.8%的增长率，1999年增长了7%。从1999年开始亚洲经济都在复苏，中国的情况可能还会更好一些。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有所迟滞，也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由于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贬值，提升了竞争力，给中国出口带来了巨大压力。现在亚洲各国经济已步入复苏，因此中国的情况照理应该会更好一些，2000年继续实现7%的增长率应该是

合情合理的。从 2000 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出口的强劲反弹，也看到了增长率的提高。因此不应有悲观的理由。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还有后劲，今后许多年还将会是这样。在今后 10 年内中国经济还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大约为 9%，下一个 10 年里 7% 的增长速度不是不合逻辑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导致这一趋势急剧变化的原因。当然增长幅度可能还会有所下降，但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仍然将有很大的增长余地。总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良好，这证明中国经济基础雄厚、健全，因此我预料在危机结束以后，今后 10 年里中国经济还将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至于 10 年以后的情形，我就不敢妄加揣测了。

问：您刚才提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在于周边环境的变化，即亚洲金融危机，您能具体谈谈吗？

答：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由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此，1998 年出现了 20 年来第一次出口总值下降的情况，这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另外，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试验性的、渐进式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一直在稳步持续地进行着。但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来临，

实际上对中国的改革进程造成了冲击，比如说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等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减缓了中国推行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促使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如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向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的步伐减慢了。显然，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对外国短期资本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对中国经济是有害的。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把深圳和上海的股市分为A股和B股，B股的波动只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财富。

但是，我们要看到，与遭受沉重打击的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基础雄厚，人民币没有过度升值；到1997年底以来的4年里，人民币一直按照官方规定的汇率自由兑换；通货膨胀率很低，1997年是0.8%，1998年是3.0%；1997年中国有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贸易继续保持顺差，外国投资继续流入。中国的确有庞大的短期外资借贷，如果外国投资者丧失信心，就可以突然撤资，但中国仍然保持了顺差，外国投资额也相当可观。因此中国应该有充足的能力应付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重新步入发展的轨道。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一旦条件允许，在汲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后，中国改革的进程就将重新启动。中国目前正在积极争取加入WTO，这表明了中国决心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信心

和决心。

问：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人在谈论“亚洲模式”及所谓的“亲族式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存在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亚洲模式”，也不相信有什么所谓的“亚洲模式”，“亲族式资本主义”的提法让我感到很可笑。与西方相比，亚洲的“关系”的确显得更为重要。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亚洲，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借助于个人的关系，其实在西方世界人们也决非超凡脱俗。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亚洲金融危机决不能归咎于所谓的“裙带式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永远存在着波动，美国也有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决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东西。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可以有許多其他词汇，并不一定要用这个词。我觉得不用这个词倒是更容易理解一些。

问：中国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引出什么样的教训？

答：必须认识到投资就意味着风险，因为只要有钱投机，就可能有泡沫成份。我们知道亚洲金融

危机最早的爆发地泰国就是如此。太多的资金流入泰国，给外汇市场带来压力。货币已经过度升值，泰国政府却仍极力保护本国货币，只能耗尽自己的外汇储备。大家一旦发现政府没有了外汇储备，就反过来拼命购买外汇，把资金逃向国外，由此金融危机爆发。

有什么教训呢？嗯，其中之一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亲族式资本主义”（笑）。其次，投资有风险。第三，过分保护已然超值的货币是愚蠢的做法。最后，资本的流动不能太自由。从前人们一直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好事情，现在他们终于明白应该适当加以限制，特别是在那些体制不够健全的国家。

7

至于中国能否避免这类危机的问题，这一次中国就已经避免了。我觉得中国人很有头脑，一直不让资本自由流动，即使是在上海、深圳股市也有 A 股、B 股的区别。外国人只能买卖 B 股，资本据此进出中国，这只对外国人的财富有影响，对中国人的财富没有影响。但是一些人鉴于亚洲金融危机，认为中国应该对外国投资抱某种审慎态度，我对此不以为然。有危害的只是短期投机基金。中国吸引的投资大多是直接投资，例如建立工厂等。与短期的“热钱”不同，这些工厂短期内搬不走。开放资本项目将使投机性投资成为可能，但中国只是将开放资本项目列为长期目标，这一点决不可以有丝毫

疑虑。做事要一步步来，不能太着急。先要把人民币变成可兑换货币，此后再审慎地考虑资本项目问题。

另外一点是，外国投资或许会出现某种程度下滑。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投资者更加小心翼翼了，但投资终究还会回到亚洲。至于中国，我认为中国已经在采取措施吸引外国投资。只有机会好大家才会投资。我觉得中国可以考虑逐步降低其关税。

问：您前面说到，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给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压力，是中国这几年经济困境的根源，那么回过头看，如果人民币当时贬值是不是也有好处？

答：贬值的好处可能是使出口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前提是人民币贬值不会导致周边国家出现新一轮的货币贬值。但有更多的理由支持不贬值。从购买力平价的观点来看，1997年和199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零或者是负数；中国有多达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由于出口顺差和外资流入，还在进一步增加中；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仍比较迅速，短期内不需要依靠增加出口来刺激经济；从长期观点来看，如果贸易继续保持顺差，外资继续涌入，外汇的供给将超过需求，自然而然导致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而且当时中国领导人一再宣称人民币将不会贬值，重诺守信将维护中国的信誉，保持在此次

危机中一直发挥着稳定力量的角色。因此维持现有汇率的好处看来远远超过了贬值可能带来的好处。

尽管有足够的经济根据和政治理由维持现有的汇率，但中国国内外都有人希望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重大意义，如果只是依靠内需不能保持这种增长态势，积极扩大出口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今年的情况看，中国出口的势头不差，但我想将来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因为周围的亚洲国家正在与中国激烈竞争。

问：既然提到扩大内需，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为什么目前中国出现了需求萎缩的情况？

答：简单的答案，要从加速原理中探寻。私人投资和耐用消费品购买不是一个产出的函数，而是一个产出变化量的函数，而后者下降了。换句话说，对电视、自行车、冰箱的需求比收入更不稳定，更多变。收入中的变化率不尽相同，当后者减缓，需求就会在更大幅度上减少。在过去两年里，GDP 仍然在增长，但增长率却下降了，后者导致需求减少。我曾经估算过中国和美国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函数情况，每次这个函数都在起作用。如果你用数学的方法来做，你就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特别变量。

问：中国该如何刺激内需？

答：总体的需求包括国内私人消费、私人 and 政府的投资以及出口。个人消费和出口的增长率一直在缓慢下降。作为补偿，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改变投资部分。这两年中国政府执行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的政策，我赞同这种做法。事实证明，中国政府采取的扩大投资的措施对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但效率的低下以及产品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使政府付出了代价。除此以外，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还可以适当进一步放宽。要治理通货紧缩，增加国内需求，不仅要通过发行国债，而且要通过增发货币来筹集对基础产业的投资。通常我是不大赞同增发货币来支持政府支出的，但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个做法看来还不坏。多发钞票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着通货紧缩，所以不用担心。现在实现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

问：有些人对由政府投资基础产业的做法不赞同，主张由市场决定投资的方向……。

答：市场在哪儿？人们信心增加以后，投资才会增加。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可以看到所有的投资机会。我主张让市场多参与，但让市场操纵一切是不现实的。有哪一位企业家会关心基础设施项目呢？

问：您长期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您有什么高见？

答：中国的改革始自 1978 年。中国的改革并没有蓝图，是采取先试验，成功了再推广的所谓“渐进式”的作法。回顾中国的改革进程，我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六个大的领域：

首先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两三年内中国农村就从集体经济转变为私营农业，农业的市场改革也基本完成了。

其次是工业领域，这方面的改革困难得多，因为国有大企业不大容易分割为小的生产单位，尽管当时有人提出要把农业领域成功的责任制推广到工矿企业。而且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的刺激机制，还取决于供求的价格和供求本身，而这一切都操纵在政府手中。因此要进行价格改革。80 年代初期国有企业在生产、分配和投资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价格改革初期，国家供给企业的生产资料存在双轨制，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数量有限的低价商品，但需要花费更高的价格到市场购买其余的商品。后来两种价格体制逐渐融合。目前国有企业的缺点或许是：管理现代企业的必要训练和经验不足，管理支出不足（仅为乡镇企业的三分之一），现有劳动力过剩且素质不高，管理体制混乱。我之所以称“或许”，是因为有许多例证表明，有些国有企业管理完备，效率高，效益好。对这些企业

而言，一个好的有能力的管理者队伍至关重要。

第三个改革领域是宏观经济领域。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努力建立一个宏观控制机制，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取代计划经济。这包括了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但事实上由于政治有时不恰当的干预，人员训练不足，对存贷利率严格控制，刺激机制不健全，银行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银行的不良贷款估计达到了 20% - 25%，危机还没有爆发出来。

第四个改革是开放政策。他们借鉴台湾省和韩国的经验，大力推动出口。70年代和80年代对外贸易逆差，90年代就实现了顺差。对外汇的管制逐步放松。开放政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鼓励外国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它帮助技术转让，提高了中国的管理水平，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提高效率。

改革的第五个领域就是鼓励经济中非国有成份的发展。在中国相应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企业是公共所有而同时是效率很高的典范。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是如此之迅猛，以致于尽管国有企业踟躇不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进步。

第六个改革领域涉及基础性、制度性的改革，主要是法律和教育。法律体系的改革缓慢但持续。形式上现代法律体系的许多内容都已经确立，包括规范商业行为、破产行为以及法庭强迫执行的法律。